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二辑）

Democracy in crisis

民主政治在危机中

〔英〕拉斯基(Hilary)著 王造时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一辑）

Democracy in crisis

民主政治在危机中

〔英〕拉斯基(H. Laski)著 王造时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政治在危机中/(英)拉斯基(Laski,H.J.)著;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政治学)
ISBN 978-7-5520-1259-0

I. ①民… II. ①拉… ②王…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945号

民主政治在危机中

主 编:李天纲
编 纂:赵 炬
责任编辑:唐云松
特约编辑:陈宁宁
封面设计:清 风
策 划:赵 炬
执 行: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笑 然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150千字
印 张:13.5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20-1259-0/D.374
定 价:72.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虽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英〕拉斯基 (H.J. Laski) 著 王造時 譯

民主政治在危機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譯者序

只有四句話要聲說：

第一、這本書是著者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之前編，如果要明瞭現代民主政治與國家的本質，這兩本書是很值得一讀的，並且讀了這本，那本也不能不讀；讀了那本，也得讀這本。

第二、這兩本書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轉變，並且是一九三〇年來世界各國政治急劇變動的反映，讀者拿這兩本書的內容來與近年來及目前正演變着的世界局面對照，一定可以發現許多饒有意義和趣味的地方。

第三、這書的內容雖然是以英國爲主要的背景，但其理論的涵義是一般的。

第四、這書譯稿在抗戰以前已經開始，抗戰以後譯者因各處奔走，未遑寧處，迄至現在，才草率完成，這是引爲遺憾的。

王造時（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於戰地旅次）。

著者原序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在北卡羅林那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應威爾 (Weil) 氏捐資講學，後來擴充而成此書。講授的時候訂定以出版為條件，但成書之期竟超過了我的約定，承蒙我的朋友格爾亨姆校長 (President Graham) 允許展延，這是我所要感謝的。

我自知我的議論是悲觀的，牠所依據的一幅現狀圖畫是黑暗的。關於這點，我的議論本身已有解釋，我以為毋須再有什麼解釋了。假如我能說服少數讀者認識深淵與我們相去之近——英國人通常是要到那個地步纔肯矚起考慮原則的——再或不然，假如批評家能夠表明我是誤解了現狀，我就感到滿意了。我達到我的結論，我是覺得扼腕的，而且是曾經長時期悉心研討了這些結論所依據的資料。我的結論倘若是另一個樣子，我該是快樂些，然而我有那不能推諉的義務，必須服從事實的驅使。

我深深感激我的同事畢爾斯 (H. L. Beiles) 與斯墨里 (K. B. Smellie) 諸君，他們對於我所討論的題目，曾時時有所發揮；我又應該特別感謝哈滿德夫婦 (J. L. Hammond) 和湯萊教授 (Professor R. H. Tawny)，因為他們的著作使我得以看透民主政治下人民的不滿的一般問題。我須趕快說明對於我討論的題目，他們雖提示了這樣深湛和同情的一種瞭解，但他們概不負有什麼責任。

至於本書的題獻，乃是對於無限的摯情，聯表微意。一九三一年我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住了幾個月，克拉克教務長（Dean Clark）和他在法學院及研究院的同事們使我了解研究學問如何是增進友誼之道。

目錄

譯者序	一
著者原序	一
第一章 安全的幻想	一
第二章 代議制度的衰落	四四
第三章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中的權威與紀律	一〇五
第四章 革命的主張	一七二
第五章 結論	一九五

民主政治在危機中

第一章 安全的幻想

一七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吉斯德斐爾 (Chateaufort) 預言法蘭西大革命將要發生的名句，乃是無人不知的，他那天寫道：『我徵諸歷史，凡政府將發生大變與革命前常有的一切現象，在今日的法蘭西，都可看見，而且日增無已。』當年控制着法國命運的人，鮮有看到吉斯德斐爾指稱的朕兆，具着何等的意義。他們之憤憤於他們自己的命運，殊無以異於『清教徒之亂』 (the Puritan Rebellion) 爆發前夕那些英國人之欣然自慰，以為英格蘭的太平無事，人民盡忠，未有甚於是時者。(註一)然而，在這兩種局面裏，其間莫不表現有各種現象，指出制度方面不能不有那些在歷史上劃時代的最後斷然的調整。

我們這些目覩俄羅斯革命實驗的人，也許與我們的前輩一樣，容易小覷了這番實驗的意義。我們(譯者按係指英國人而言)與俄羅斯經濟情形的不同是很大的。我們的民族性格，我

們的歷史傳統，都促成了一種大相懸殊的進化。我們的行政機構並未腐化。我們的中等階級，雖曾遭受種種的損失，但依然健在，而且自信有力量。任何鼓吹革命的政黨，概未達到那種足以傾動選民耳目的重要程度。任何隸屬左派的重要政黨，概未明白地承認，說是願意脫離憲法程序的傳統路線。國家軍隊亦無背叛政府的表示。罷工雖然接一連二地發生，像英國且曾有一次總罷工，但並未遇到了不得的損失。一般工會在若干年來所處的地位，可說只有招架之力，並無還手之方；近年間工會一椿顯著的特色，便是會員人數的激減不已。此次經濟蕭條，固然險象環生，蔓延甚廣，為空前所未有，但此次不景氣的造因已在化除之中。可惡的賠償制度是已經結束了。協約國間債務之一筆勾消已日見其為不可避免之舉了。戰後那種不祥的經濟國家主義的風氣說不定已經過了牠的最高峯，盛極將衰了。國際匯兌方面已迅速發現一個適當的基礎，其發現的迅速，竟超過一九二八年經濟大變以前所能希冀的了。回溯拿破崙時代幾番血戰以後，歐洲蹂躪之餘，糜爛不堪，費了三十年功夫，纔得恢復元氣。由此言之，現世界大概也要經過一個相同的危機期間，纔能發現各種基礎，以建築一個新的平衡狀態。

誠如亞當斯密斯 (Adam Smith) 所言，一國之中有許多敗壞的地方；然而我們也無須否認任何社會制度天然具有恢復元氣的力量。但據我看來，一位精細的觀察者，若願意看個透澈的話，總不會盲目於我們周圍的種種現象，那些現象至少在過去，常是社會騷亂的先聲。我們周圍有的是貧富與強弱的懸殊；我們今日對於這些懸殊情形非常深惡痛絕，所以自從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那時候以來不大爲人說起的社會平等哲學，今日又重整旗鼓起來了。那些失勢的人表示了種種半自覺，但出自於心的抗議；這種抗議愈是無效，那些人愈是憤恨不平；從這方面說來，那次英國的總罷工，和美國加斯頓尼亞(Gastonia)與希棱(Heeren)兩地的總罷工，我們若愈加以慎重考慮，其意義亦愈見重要。對於人民憤激不平所加的壓制，處處都是日漸澈底化起來。一九二七年的英國勞資爭議條例(the British Trades Disputes Act of 1927)是英國立法史上，自從一七九九年的結合條例(the Combination Acts of 1799)以來，第一次仇視工會的法律。美國勞資糾紛事件中，禁止騷擾命令的運用，雖未必如其贊助者或其反對者誇說的那樣重要，(註二)但其影響所及，殊不免使美國的勞工團體視法院爲資方爭取經濟權力之又一工具。(註三)英美兩國對於共產黨人的處置方法，以及特別在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共產黨人所遭的慘遇，均足見各該國仇視言論自由之心，已達於嚴重的程度；而一個嚴厲地迫害人民的政府，總是一個感覺其自身基礎受到了威脅的政府。用暴力來解決政見的不同，(這一種習慣一部分無疑是由歐戰而轉劇烈的，)似乎已成爲我們一種心理，自一八四八年那些慘劇以來所未有。意大利與俄羅斯不過是一種過程中的最後表現，如今還有其他地方在這種過程遞嬗演變之中。

現在風靡世界的心理便是一種深刻與普遍的幻滅。我們這時代的人似乎已失掉價值的體系。準確性已爲玩世不恭的態度所代；希望已爲失望所替。藝術、文學、與音樂方面的種種運